

# 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美学体系

□杜学文

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人们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改革的同时,人们的审美现实和审美需求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外在的、物质的东西的改变必然对人内在的、心灵的需求产生影响。需要我们重视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与人的价值追求密切相关。一种社会的变化也可能是从人对某种价值的认同开始的。而这种价值观的变化和确立,并不是仅仅表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更多也更经常地是表现在人日常的精神生活之中。我们喜欢什么、追求什么、向往什么,更多地是在日常生活的细微行为中不自觉地体现着,比如从人们的衣着、时尚、休闲、娱乐、饮食等生活细节当中流露出来。当然,这其中也就存在一种对什么是美,什么是高雅,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认定,是一种从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的审美行为。但是,我们的美学理论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世界缺乏关注,更缺少深刻的理论总结。这种理论的失语不仅对艺术创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审美追求也严重地缺乏引导。由审美而来的对价值观念的偏差并不仅仅是艺术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它不仅对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产生制约,也将因此而对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除了我们已经意识到的正确的价值体系的构建外,适应时代要求的美学体系的构建也至关重要。这种美学体系至少应该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品格。首先,应该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漫长历史对人类的审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贡献是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比如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统一,就对中国美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重视人自身内心世界的修养,也在中国的艺术中有非常生动的表现。这些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元素应该很好地体现在我们新的美学理论之中。其次,应该广泛吸纳人类审美实践中与我有益的成分。中华文明一个非常突出的品格就是具有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绵五千年而活力不止,充满魅力,就是因为她从不拒绝排斥其他文明中与我有益的东西,并且能够更好地吸纳、改造,与既有的文明融为一体,形成具有新的生命力的文明形态。第三,应该是具有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品格。虽然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有先有后。但从文明的品质来说,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把某种文明设定为先进的,某种文明设定为落后的。我们应该更注重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形态中需要什么样的文明。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文明形态不仅不能说是先进的,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因为它将摧毁现存的社会秩序,使之陷入混乱,甚至灭亡。这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审美理论也是如此。我们要构建适应时代的美学体系,目的就是要解决我们现实生活,特别是审美活动中面临的问题。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任何理论都是我们所不需要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发达地区的理论就是先进的,欠发达地区的理论就一定是落后的。衡量一种理论的先进与否,主要的标准是看它能否解决现实问题。一味泥古遵古,抱残守缺,将使既有的文明窒息。盲目地崇拜洋风、移花接木,将使既有的文明断裂。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继承民族文化中具有生命活力的优秀成分的同时,合理吸收接纳融合其他文明中于我有益的元素,形成能够解决我们现实

## 心灵的对话

□贺仲明

在现行的文学体制和许多人的观念里,文学批评似乎被隔离在文学之外,其实,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著名的《文学理论》中所指出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直接关系着时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所以,当一个批评家从事批评工作的时候,他所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是文学的原则——作为人类心灵世界的产物,文学绝对有自己独立的原则和评价标准。文学批评不应该成为政治、经济或其他权力的工具,也不应该以其他标准来代替文学的标准。

从这一原则出发,文学批评与作家的关系也应该是心灵之间的交流。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批评家也应该从心灵出发来进行批评。一方面,文学批评应该体现出“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在尊重文学和作家的前提下进行批评工作,应该突出“他是什么”而不是“他不是什么”,不是以其他外在条件对作家的苛求,而是以作家本人作为中心对作家的尊重和认真研究。因为每个作家都有不足,不可能是全面的,批评当然也不能求全责备,不能以抽象的“真理”来要求作家和作品。在文学批评中,文学史的背景作用应该主要是考察和检验作家独创性的工具。同样,比较的方法也是一样,要建立以作家为主体的自然的比较,而不是外在于作家的生硬的比较。

但是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又不应该是乡愿式的和稀泥,它应该有原则,有立场,有自己的主体性和超越性——这种主体性建立在对文学尊重和深入认知的基础上,但拥有批评家超越性的独立思考——在当前文学批评大规模地丧失立场的情况下,这一点也许是应该特别强调的。批评家更应该被批评对象所拘困,而强大的站得住比批评对象更高更远,要对创作潮流有激励和引导作用,而不是跟随在创作后面亦步亦趋,要拥有比时代文学更高的、更客观的文学标准来要求作家和时代文学,其目的是激励文学超越现状,走得更远更高。批评家与作家相比要更理性,更冷静,更有文学史的视野和客观的高度。真正和谐的创作和批评的关系,是像19世纪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果戈理这样的关系,是独立思想的平等交流,而不是作为作家的附属。一个批评家可以没有作家朋友,或者他和作家可以生活在生活中是朋友,但在文学批评中就只存在职业关系,他们共同为时代文学事业负责。

我在这里所说的批评观也许是文学批评的常识,但也许正因为太常识了,反而容易被人遗忘。我不是一个专职的文学批评家,但我愿意保持对文学的一分热爱,愿意遵循文学批评的常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问题的理论指导。这就要求我们要对目前审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是审美形态发生了变化。就中国传统美学而言,对艺术并没有严格的分类。但目前我们习惯使用的分类是从欧洲的教科书中传来的。即把艺术分为包括文学、美术、戏剧,以及建筑等在内的十几个类型。当然也有以社会实践为研究对象的所谓“伦理美学”等。这种分类对我们来说比较习惯,也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艺术类型不断出现。比如,19世纪末,出现了电影;之后随着电视传播技术的出现又有了电视剧。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网络有关的艺术形式不断涌现。如网络小说、网络游戏、网络动漫,以及还很难说是不是艺术的各种博客、播客、微信、短信等等。与技术进步有关的艺术形态的出现相伴随的是艺术的商业化表现更加突出。不仅各出版社追求出版物的发行量,电视台追求电视剧的收视率,电影和舞台作品追求票房收入,以互联网为传播渠道的各种艺术形式都成为互联网商业运作的重要方式。网络游戏的经济效益已经成为今天重要的经济模式。2013年,网络文学的收入规模达46.3亿,更是成为资本的宠儿。对这种审美形态的变化,我们的美学理论基本处于失语的状态,不仅没有具有理论高度的总结,甚至没有较多的关注。那么,如何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使之进入美学的视野,并形成能够引导其发展的理论,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与之相关的是我们的审美活动也发生了变化。从人类审美实践的历史来看,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最早的审美活动是与人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的。即人在从事某种社会实践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审美实践。比如远古的人们在劳动中形成了劳动成果,感到了自身生命的价值,内心生发了喜悦,就是一种审美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艺术形式更加多样,艺术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艺术也逐渐成为特定的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与普通人的审美大众出现了分离。这时,人类的审美活动需要特定的条件和场合。比如,要欣赏戏剧,就要到有舞台的剧场才能完成。要看电影,必须到电影院。但是,目前人类的审美实践似乎又呈现出与远古时期相似的特性。互联网的出现,及其技术的不断改进,使人们的审美活动更加方便。比如,人们不必到剧院就可以在互联网上看戏剧表演,不用电视机就可以欣赏电视剧。而且,这种审美活动逐渐变成一种具有随时随地的即时性状态,重新出现了与人的社会实践重合的样式。我们可以在写文章的同时听音乐,因为互联网与无线传播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方便,而不需专门去音乐厅;也可以边旅行的同时看电影,而不必去电影院。当然,这种即时性也带来了随意性。一部电视剧可以看到一半的时候停止,到有时间的时候再接着看。而不必守候在电视机前,受制于电视台的播出时间。当人们收看《新星》《渴望》《陈真》时万人空巷的状况可能不再会出现。

在人们审美活动更加方便的同时,审美创造也表现得更加复杂多样。当艺术创作逐步专业化的同时,艺术也出现了与大众分离,成为“专业者”的劳动。这种状况的进一步发展就使艺术创造成为一种职业,出现了诸如作家、编剧、演员、画家等具有专门技能的人。同时,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艺术作品与社会见面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实现。比如,一部电

都市文学研究的兴盛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情。它有一个相当坚实的现实基础,那就是近30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渐加速,而这—进程仍在快速的通道之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来说,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城市化。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城市的兴起、城市空间的扩张、城市人口的膨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东北老工业城市等,是中国正在上演的现代化大剧的热点。经过30年的发展,城市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只占全国人口20%,变为2011年的51%,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在这样一个现实语境下,也对城市生活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批评界对于都市文学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的研究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过去的乡土文学一家独大,一变而为二者几乎平分秋色。

都市文学研究的兴起是一种“追溯式”的,是与城市的兴起、城市文学的大量涌现密切相关的。迄今为止,关于都市文学研究最“发达”的部分仍然是“现代”部分而非“当代”部分,研究最深入的是“京派”和“海派”,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内容。杨剑龙教授主编的这本39万字《都市文化研究读本:都市文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从内容编排上无疑反映了都市文学研究的这种现状。杨剑龙的序言《中国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学研究》对于都市文学发展与都市文学研究扫描式的总结和评说。该书的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现代文学论”、“当代文学论”、“京海文学研究”、“都市文学个案”,其中老舍、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京派”、“海派”、“新感觉派”等文学流派仍然是编选的重点。同时,“现代文学论”又相对强于“当代文学论”,这也提示读者,都市文学研究仍然具有广阔的学术讨论空间。该书基本反映了都市文学研究近10年来的现状,文章作者包括李欧梵、杨义、严家炎、陈平原、陈思和、王德威、程光炜这些学术名家,也有吴义勤、陈晓明、杨扬、施战军等实力派学者。

## 史论的品格与审美的维度

□朱华阳

胡德才的《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把现代喜剧从文学史中独立出来并专论之,“其视角之独特、见解之新颖、论述之精幽、文风之严谨确实让人有眼睛一亮的感觉”。

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喜剧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该书从喜剧的审美特性切入,在对具体作家的分析评价和对作品的阐释品评中构建起喜剧文学的历史世界。作者依据个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尺度去品评分析作家作品。《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的“绪论”简约精辟地分析了喜剧的萌芽发展、功能本质和审美属性,勾勒了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发展的大致轮廓以及外国戏剧对中国现代喜剧的浸润。这其实为后面的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支持、体系的脉络和观照的角度。全书钩沉了20位现代喜剧作家,对每位作家在喜剧史上的意义、价值和局限——做出个人的评鹭,精辟坦诚地提出了个人的论见。如对余上沅的研究,书中从他的生平经历、理论主张、戏剧活动和创作实践等层面加以分析论述,充分体现作者治学的精细与著述的谨严。在丰赡的材料和小心论证的基础上,大胆肯定了余上沅等人倡导的“国剧运动”的劳绩,指出其“实质就是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话剧”。这是不拘成套的创见和卓识。尤显特色的是,书中对每位作家的评析都用一句有意味的话语概其要义,

视剧的播出需要有电视台这一平台,一部小说的问世需要通过出版社这样的机构。这些机构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实际上也限制了大众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把大众与艺术分离开来。但是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分离的局面,使大众的艺术创造能力得到了充分自由的发挥。任何一个人的文字不再经过编剧的审核就可以随时发布到网络上;也不必经过电视台之类的平台就可以把自己拍摄的作品放到网络上。自媒体时代解放了人的艺术创造力,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繁荣。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仍然是一种庞杂的、鱼龙混杂的现实,其水平良莠不齐、高下不分。但是,这种新的传播技术在把艺术创造还给大众的同时,实现了人类审美活动的返祖,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循环。

面对人类审美活动的巨大变革,我们的理论表现得十分迟钝。一方面,对新的审美现象缺乏关注,缺乏时代的敏感性;另一方面,自身的建设也远没有完成。中国的美学理论一直以来即是在不断吸收外来审美美学的进程中发展的。比如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对欧洲艺术,也包括宗教文化的吸收。特别是上世纪以来对苏联美学的吸收等等。在这种吸收、借鉴的过程中,我们的审美理论基本完成了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蜕变,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大量的西方理论被移介进来。比如所谓的结构主义美学、心理分析美学、接受主义美学、解构主义美学等等。这种译介对当时的美学理论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可以说,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关于艺术的认识,拓展了艺术的表现力,使艺术的表现手法更加多样化,在丰富、改造我们已有的美学理论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就我们的理论建设而言,仍然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这些外来的理论和方法没有很好地与中国既有的理论结合起来。二是在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译介后,没有整合成能够代表新的发展需求、能够解决中国目前审美现实问题的理论体系。三是这些理论自身所具有的消极性对中国的艺术创作形成了负面的冲击,以至于一些创作者简单地奉西方理论为主臬,以为这种理论就是先进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而实际上走上了背离艺术本真、瓦解人类精神的道路。对这一现实,我们无法回避。

吸纳借鉴外来的审美理论当然是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理论在别一社会文化环境中体现出来的合理性,也不能否认它们对自身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其合理的精髓以吸收其长处。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需要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那些不适合中国艺术发展、有碍于正确健康的审美追求的东西加以分辨、舍弃,不能简单地全盘接收。从方法论的层面看,任何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将造成理论的僵化或断裂。从历史发展的层面看,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全盘吸收,而是在实践中加以辨析扬弃完成的。佛教进入中国后,对中国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中国文化仍然是中国的,没有变成佛教文化。中国山水画法传入欧洲,丰富了欧洲艺术对自然的表现手法。但欧洲的油画没有变成中国的山水画,其表达的思想与价值也与中国不同。因此,在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借鉴之后,是到了把中国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东西与外来文化中与我有益的东西融

## 都市文学研究的回眸与推进

□孔小彬

《都市文化研究读本:都市文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一书不仅反映了近年来都市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近年来的研究新拓展。通常认为,都市文学是相对于乡土文学而言的文学范畴,范伯群《论“都市乡土小说”》从通俗文学的研究视野出发,指出现代都市文学的乡土性,都市文学是与乡土文学融合在一起的;吴福辉的《多棱镜下有关现代上海的想象》改变了我们对于上海都市提纯化的想象,而尽量还原其新旧混杂、层积叠加的“原生态”镜像;杨剑龙的《论上海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尝试从城市特有文化的角度阐释都市文学的总体特征,它紧密结合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特征,论述上海文学呈现出的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张鸿声近年来的研究着力于上世纪50-70年代的城市文学,他的《上海城市政治身份的叙述(1950-1970年)》一文填补了这一历史时段上海城市文学研究的空白。在都市文学个案中,老舍、张爱玲等作家曾被反复研究,而作为现代上海重要通俗作家的徐许则鲜有人关注,吴义勤的《徐许的遗产》则专文加以论述之,在高度评价徐许的文学成就之外,也指出他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刘勇的《“京派”文学的文化底蕴》虽然讨论的是人们熟悉的“京派”文学,但他以宏观的视野讨论“京味”与“京派”的关系,提出“京派”的作者往往都是外乡人,而“新京味”小说又缺乏宽厚的人性关怀、深层的文化意蕴、犀利的社会批判这些“京派”文学的文化底蕴,二者结合最

合起来,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构建的时候了。从现实层面看,也许外来的艺术家、理论家进行研究和探索的实践是真诚的,但并不因此否认其政治家、战略家把某种理论和文化作为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斗争的工具。当我们接受艺术和审美活动是一种“纯粹的”审美行为时,却不知道,它遮蔽了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包括各种理论的宣传、艺术领域的国际性大奖等手段所进行的审美渗透和价值颠覆。我们注意的比较多的是对东西方冷战以来意识形态斗争思维的否定,以为强调审美活动的价值观是双方冷战的表现。冷战结束这种现象就不应该继续。但是我们知道不多的是随着西方冷战的胜利,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努力实际上更加突出。而且,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也时刻存在着文化上的争夺。这就是为什么法国要坚持在国际贸易中“文化例外”的原则。其目的就是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抗争。事实上,在西方,包括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从政府到社会,文化利益的敏感性从未丧失,而是表现的非常强烈,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包括美国企业诸如迪斯尼乐园、麦当劳快餐、可口可乐饮料这样的“泛文化”领域,在进入法国时都非常艰难,不仅引发了知识界的批判、媒体的抗拒,甚至也引发了激烈的暴力事件和抗议活动。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其对法国经济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因为法国人忧虑其是对法国文化的打击。尽管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与美国有许多文化上的相似性和战略利益的同盟性,但在文化领域,其攻防仍然表现得非常激烈。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与经济体,与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欧美文化不同的中华文明,其发展进步对既有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非同小可,对不同文明范围和利益格局的影响意义重大。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也更为激烈。当我们茫然不知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塑造成一个落后的、弱势的,甚至是黑暗的、专制的、需要西方文明拯救的民族,一些人对自己正确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怀疑和偏离。这种怀疑和偏离在审美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试想,我们有多少人知道或在研究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有多少人在张扬、宣传、确信中华文明对人类审美能力的创造和塑造?有多少人不自觉地在西方话语体系,包括审美体系的规定中思考、探讨问题?如果我们背离自身的文明,不仅难以解决存在的问题,也将从根本上丧失自己的文化。有人说,一种文明的消亡往往是从审美权的丧失开始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

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政治的民主、社会的和谐等外在的东西。还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的强大,其核心是价值观的牢固确立。如果我们盲目、片面地追随外来的文化,简单地以他人之美为己之美,以他人之是为己之是,将导致民族审美话语权的丧失。不仅难以解决现实审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也将从根本上颠覆自己的文明。由此看来,构建能够适应时代要求的美学体系是我们迫切需要进行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工作。

## 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 都市文学研究的回眸与推进

好的是老舍;杨扬的《作为文学类型的海派文学》指出作家面向市场写作决定了上海文学具有多种类型,上海都市空间生存环境使得现代上海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犹如火山爆发般涌现而非自然的缓慢发展,该文指出了上海文学的重要特征。此外,徐德明的《“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着眼于当下农民进城的文学书写,论述了城市文学的新景观;王德威的《香港的情与爱》研究的内容是大陆学界相对陌生的文学中的香港城市书写;汤哲声的《中国吴语小说论》讨论的也是大家不太熟悉的南方都市方言小说;李欧梵的《重绘上海的心理地图》、陈平原的《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等文则在方法上将西方所谓文化研究同传统的文学研究相结合,论述城市与人的关系、城市的历史感、城市文学的记忆与怀旧、城市中心人的心灵印记等,论述颇为轻松散漫,别具一格。《都市文化研究读本:都市文学卷》一书给人的启发是多方位的,它真实反映了近年来都市文学研究领域多方面的新拓展,既有研究内容上的新突破,也有研究观点上的新认识,还有研究思路方法上的新呈现。

如果说《都市文化研究读本:都市文学卷》这个研究论文集还有什么不足的话,我想大概在于它是一个“因人选文”的选本,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因选文比较看重作者的名气,一些名气相对不大但可能有真知灼见的作者的文章就较难被选进来。此外,论文所涉及的都市文学范围大多集中在上海、北京两座大城市,似乎对其他大型城市的关注还不够,当然,这很可能不是编选的问题,也许这方面的论文本身就欠缺。

品是与沉潜历史底层的生命的对话,我们就可以重获以前历史的某种特殊境遇,从中寻到文学的“本己意味和真理”。同时也形成对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性因素的自觉疏离,突显出文学的自主性和它对抗现实世界的“异在性力量”。

书中只解析了作为文学历史细胞的作品,形式虽是自由散漫的,内容上却有线的清晰与点的深刻。这20位作家及其作品实质上构筑了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格局。表层是循着时代发展的线索演进,而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隐含着世态喜剧和讽刺喜剧二元交叉并进的发展格局:从陈大悲、熊佛西至陈白尘、老舍等为讽刺喜剧的流变,从丁西林、宋春舫到李健吾、杨绛等乃世态喜剧的传承,当然是复杂混合地发展的。在这主脉上,众作家作品犹如珍珠串于其中,有的是作者亲手拂去历史尘埃让其闪发出艺术的光彩,如王文显、袁昌英、宋春舫等,有的是经胡德才的琢磨后闪烁出崭新的光芒。在每点上的分析是深广的,如我们可以从余上沅看到“国剧运动”的沉浮,从《委曲求全》看到欧洲世态喜剧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远眺中国现代喜剧文学的发展,“五四”理论先驱蔡元培、吕涛、范寿康、鲁迅、林语堂等人为现代喜剧的审美范畴和美学体系的建构作出了宝贵的历史贡献,对当年和以后的喜剧创作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另外他们的理论与喜剧创作实践的长期背离,无法成为现代喜剧发展主潮,也导致喜剧创作在新文学领域中处于滞后状态。而宋春舫、欧阳予倩、余上沅、熊佛西等戏剧家致力于戏剧本体学和舞台艺术的探究,尚不能将其研究视野提升到戏剧美学层面,这种状态阻碍了喜剧理论与创作实践建立一种相辅互用共同促进的发展格局,有时发生理论与创作的疏远背离。《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未能涉及到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种遗憾吧。